

巧合

——研究一個看似已經「消失」的文化



二〇二三年八月七日，下午三時至五時

蒲 —— 蒲慕州

李 —— 李 華

1 棄理從文，從頭開始

李 中國媒體介紹您的時候，經常說「華人埃及學博士」，特別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取得學位。據我所知再往前就只有民國時期的夏鼐先生（1910–1985），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取得英國倫敦大學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為〈古埃及串珠〉。您出生成長在臺灣，留學美國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事，當時為甚麼沒有選漢學而選了埃及學？

蒲 我進入埃及學研究領域的原因可以說多半是巧合。

我原來是學理科的，高中畢業先考上了臺灣省立海洋學院（現在叫臺灣海洋大學）的機械系，學輪船機械，上了一個學期的課，興趣慢慢就轉移了，想念哲學。

當時臺灣中學人文學科教的東西，當然有歷史，還有儒學，就是「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主要是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些，道家一概不學。因為當時臺灣教育系統認為老莊是消極的，不正面，排斥它，基本上沒有人講道家哲學；但後來上了大學就不同了，大學國文課有莊子。大一選讀莊子後，覺得天地變了一個樣，覺得機械不

是我最想學的，於是上了一個學期的課就不讀了，想重新考一個學校。當然，這也跟當時流行的氛圍有關，上世紀六十年至七十年代間臺灣流行存在主義。所謂對哲學的興趣，基本上是年輕人追求某種知識上的時髦，說一些不著邊際的憤世疾俗的話，好像要顯示自己比較不尋常，對不對？（笑）

當時臺灣大學聯考分甲、乙、丙、丁四組：甲是理工；乙是文史哲；丙是生物，包括醫學；丁是社會科學，包括社會學、心理學。我原來是甲組，後來就考乙組。我高中時唸理科，歷史地理是很差的，根本不讀，所以要補習。補習時和一個臺大哲學系的香港僑生搭租房子，他後來博士畢業，在東海大學教書。我們住在一起就聊天，對哲學有興趣啊。

那時候全臺灣大概有四個哲學系，臺大、文化大學、輔仁大學、東海大學，填志願的時候，覺得能考上就不錯了，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個志願填下來，就記得報了個收分最低的中國文化大學（當時叫中國文化學院）的哲學系墊底。前面的志願不記得怎麼填的，隨便亂填，結果考得太好，就考上了第一志願臺大歷史系。班級中，我是第四名，第一名是熊老師¹……（笑）

1 熊秉真，蒲慕州伴侶，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布朗大學歷史學博士及碩士，哈佛大學理學碩士。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學術機構國際哲學與人文科學理事會（CIPSH）秘書長、亞洲新人文聯網（Asian New Humanities Net）創建主席、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國際哲學及人文科學委員會新人文講座教授。研究領域包括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史、近世兒童史、中西性別研究、中國醫療文化史。專著有 *A Tender Voyage: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a*、《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安恙：中國近世兒童的疾病與健康》、《幼醫與幼蒙》等。

臺大也有哲學系，如果當時我真要唸哲學，也可以轉系。但考上了歷史系後，覺得歷史系很自由，也很容易過關，容易混，也不錯。喜歡哲學，我就自己去修哲學的課，像希臘哲學甚麼的。1971至1975年在臺大歷史系讀本科，主要學的是中國史，上的課比較多的是秦漢史；非中國部分的課呢，當時叫做西洋史，還不叫世界史，都是很通識型的課程，給一般本科生讀的。

OK，這是伏筆吧。就是說呢，對哲學的興趣一直都有，尤其希臘哲學。當然，那時我還不會希臘文，但是覺得希臘哲學還蠻有吸引力的。在歷史系學的所謂西方歷史，包括希臘史，基本上沒學到甚麼，因為沒有老師教，專業希臘史或者羅馬史都沒有，只能夠很一般地講講西洋古代史。

李 如果這樣，後來出國留學不是應該選希臘史、羅馬史嗎？

蒲 是很想學希臘史，就是所謂的古典學吧。但問題是，那時臺灣根本沒有人教希臘文、拉丁文。天主教教會學校或神學院可能有授，但臺大就沒有，所以無法申請。當時美國的研究所要求，如果你要去讀 classic study（古典學），先要有這個語文（希臘文、拉丁文）訓練，才可以申請相關科目。反而，埃及學沒有這個要求，大部分人也都是進了研究所才學的埃及文。

我想出國去學習非中國的東西，可是又碰到語文的問題。完全是巧合，當時有位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的美國學生在臺大學習，我和熊老師認識他。聊天時說起，他說你這個 classic（古典）不能唸，但你可以唸埃及

學。我那時候還沒聽過 Egyptology（埃及學）這個詞。

所以，最後去讀埃及學，也真的是一個巧合。怎麼講呢？因為那時候我們申請去美國唸書，都是一口氣申請好幾間，希望要有獎學金，我申請的幾間大學都是學東亞史或中國史，只有布朗大學申請的是埃及學。為甚麼會想去申請埃及學呢？其實完全沒有背景的，這就是個人原因——因為熊老師拿到了布朗大學的獎學金。她要去，那我說我也得跟去啊……（笑）

李 布朗大學也給您獎學金了嗎？

蒲 沒有獎學金，我去的第一年，是我姐幫我付了學費，我姐姐當時在美國嘛。所以還是很幸運，還有姐姐在那兒。

所以你說，有甚麼推動力啊？都沒有，完全是非學術的理由；唯一可能，就是前面說的一些伏筆，我對於非中國的東西有些莫名其妙的興趣，尤其是哲學，但那些要說把它轉換成埃及學的話，其實中間還有一大步，還差得遠。所以主要的推動力，不過就是個人原因，對不對？

李 讀埃及學的 offer 是怎麼拿到的？

蒲 我的導師 Ricardo Caminos（1916–1992），他算是一個奇怪的人。他幹嘛收我這樣一個沒有背景的學生？我到現在還是覺得奇怪。我的申請信寄到布朗以後，由學校轉給他，當時他在埃及。1976年春天，他從埃及寫了一封信給我——那時候還是用那種很老式的航空郵件，外面貼個郵票，寄到臺北。他說，我可以接受你來唸研究生，但是你能來一年——他當時就說了。因為剛好下一年（就是1976至1977年），他回到了美國，會在校園內整理他的考

古報告。

李 只能讀一年，那之後怎麼辦啊？有沒有想過後面怎麼辦？

蒲 沒辦法想啊……那時候就說，非要去不可嘛……

李 反正一定要跟熊老師到布朗大學讀書就對了！但一年之後轉學，不就分開了嗎？

蒲 是分開了，但讀完第一年，我們就已經結婚了。也不是隔得太遠，開車只要七八個鐘頭吧。

李 ……

2 1977年1月攝於美國布朗大學校園內



2 埃及學的起點

李 學埃及學過程是怎樣的？很困難吧？

蒲 一旦去到布朗大學埃及學系開始學習，似乎就進入一個既定的程序。最初的時候，我的確遇到極大的困難，第一學年結束時亦曾經想放棄，轉回讀中國史。當時的困難是多方面的。英文程度不夠好是基本原因，在布朗的一年，除了埃及學課程，我還上了「希臘藝術」、「希臘化時期的宗教」這兩門課。我是完全沒有基礎可言，所以學得很差，結果只能說是只學得一些皮毛，聽懂了一些術語。「希臘化時期的宗教」期末報告實在沒辦法寫任何題目，因為不懂希臘文，不熟悉古典文獻，不知道宗教信仰的議題何在。結果只好寫了莊子（約前 369 年-前 286 年）和伊比鳩魯（Epicurus，前 341 年-前 270 年）的比較。這可能是日後我做比較研究的萌芽吧？但當然，英文不行，寫的文章只能用「膚淺」二字形容。

李 原來您也有英文不行的時候……但您當時的英文應該已經很好了。

蒲 怎麼講呢，反正「讀」跟「寫」可能還可以，但是「說」是很難的，因為沒有那個環境對不對？所以講英文是很難的。沒有很順。

李 那麼您是怎麼過關的？

蒲 「希臘藝術」的期末報告寫的是托勒密時代早期一個埃及祭司（叫做 Petosiris）家族的墓葬壁畫。我原來當然不知道這個墓葬，是我的埃及學指導教授 Ricardo Caminos 建議的。

我做的研究是討論壁畫中希臘藝術的影響。由於 Petosiris 生活的時代跨越古埃及王朝的結束和希臘人統治的開始，他的墓室壁畫呈現出傳統埃及壁畫的格局，但是畫中人物的形象有希臘繪畫的因素。

反正，兩門課都及格。兩位教授知道我是埃及學研究生，又是中國人，網開一面吧。但畢竟這兩門課也讓我有些機會認識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的內容，在之後的學習中能有些基礎概念，自修時也比較沒有心理障礙。

李 埃及學課程都有甚麼內容？Caminos 教授怎麼教您的？

蒲 埃及學的課程，基本上是文字、宗教和歷史。另外有一門銘文學，Egyptian Epigraphy，主要學習如何描繪埃及銘文。Caminos 教授當時正在埃及進行 Gebel El-Silsila 新王朝時代神廟的考古研究，他對神廟銘文的臨描十分重視。由於我有中文書寫的背景，我寫埃及象形文字的「書法」還不錯，這也許是他要我學的原因。不過可惜我並沒有機會去參加他的考古工作，學的銘文描繪技術也就派不上用場。

李 銘文學課怎麼上課？

蒲 這課的上課方式是由教授拿出一張神廟銘文的照片，我再用一張 tracing paper 蓋在上面，用針筆把象形符號描繪出來。這中間的問題是，銘文常常是破損的，必須設法重建那些符號。重建的方法是找到類似的銘文字句，加以比較，或者看上下文，推測可能的符號。所以這不只是簡單的描圖，也是學習埃及文的方法。面對神廟或墓葬銘文的埃及學者必須精確地描繪文字符號，必要時重建，再將結果轉寫成標準的埃及文字符號，供其他學者研究用。這有

點像中國古文字學者做甲骨文或金文拓片的工作。

李 是不是要先掌握古埃及文才能修這門課，或至少有些基礎？古埃及文怎麼學？

蒲 是的，要懂基本埃及文。跟 Caminos 教授學習的一年，最主要就是學中王朝埃及文。這是古埃及文字的成熟期，意思是它的文法結構在書寫文本中表現得最完整，譬如人稱、時態、拼音等，都比較規律，因此學習起來比較容易上手。這是相比舊王朝時代的文字而言，如果用中文來說，則可能是金文與甲骨文的差別。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王朝埃及文的標準教科書是 Alan Gardiner (1879-1963) 著的 *Egyptian Grammar*，我就是用這本，另外又輔以德文和法文的兩本埃及文法書。我當時可以勉強閱讀德文和法文，但用一種不熟悉的現代語言去學另外一種古代語言就非常勉強；所幸英文那本是當時最好的文法書，故另外兩本就很少用。總之，所謂上課，其實是自行閱讀文法，每個禮拜教授就給你打上一個進度，讀一章或兩章這樣，讀完以後就做作業，做書中的翻譯練習，即將埃及文例子譯成英文，上課時由教授批改譯文，並且解釋錯誤之處。也就是說，除非你翻譯錯誤，否則表示你的理解應該是正確的，就像小學生學字一樣。就這樣，我學了一年埃及文字，寫象形文。我當時是沒有選擇，但後來回想，這應該不是唯一的方法。但研究生不是初中生，要老師逐課講授，可能也沒有絕對的必要。

第二年之後我轉學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上課時會閱讀文獻，方法是先做好埃

及原始文獻的翻譯，上課時讀出音譯（transliteration），再讀英文翻譯；教授則詢問字句的個別意義及文法結構，是現在式？過去式？過去分詞？主動？被動？學生得自己解釋為何這樣翻譯。

李 轉學是導師給安排的？

蒲 是的。Caminos 教授是單身的，沒有結婚，他就像一個耶穌會會士，一輩子就只搞埃及學。他是阿根廷人，到美國唸埃及學，然後又從美國去了倫敦，讀了兩個埃及學博士學位，一個是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埃及學博士，一個是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埃及學博士。學問非常好了，不管是埃及文或者考古，他都有出版物。那個時候他正在埃及做考古，基本上是把埃及一個新王國時期的神廟銘文出版了，畫圖做拓片，把文字畫下來，轉寫，搞了兩大本。他那一年就在布朗。這也算是巧合了。

赴美第二年，由於 Caminos 教授要再度前往埃及研究，我被安排轉學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近東研究系，跟隨 Hans Goedicke 教授（1926–2015）繼續學習。Hans Goedicke 教授是奧地利人。搞埃及學的人就那幾個，互相都認識，轉學好像就是寫份申請就完成了。由 1977 到 1984 年，加上在布朗的一年，我總共花了八年的時間取得學位。

3 學習多種語言

李 古埃及文字、文獻與書寫方式在傳承上有哪些獨特之處？

蒲 1977 到 1981 年之間，我在霍普金斯上的埃及學課程主要是研讀不同時代埃及文獻。舊王朝有金字塔文及墓室銘文，中王朝有小說故事、墓銘、棺木文、智慧文，新王朝除了這些類別又加上神廟銘文、「死者之書」、詩歌，等等。古埃及文字從比較古拙的舊王國時代埃及文進化到中王國時代的中期埃及文，再發展為新王國時代的晚期埃及文，文法結構由簡單到成熟，愈晚愈反映有口語化的趨勢。在二十六王朝之前，埃及文獻書寫方式有正式的銘文 Hieroglyphics，相當於中文的楷書，一般叫象形文，因為它的字母就是一個圖像；有日常書寫用的 Hieratic，即是線條簡化的象形符號，相當於中文的行書；晚期埃及文叫 Demotic，大約公元前七世紀開始出現，是較 Hieratic 更進一步的簡化，基本上看不出任何象形圖形，類似草書，非

3
1978年7月攝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